學習場域的擴張：廟宇作為文化基地

——以方坤邕在碧霞宮的教育經驗為例

宜蘭碧霞宮又名武穆王廟，1896年由擔任宜蘭支廳參事的楊士芳（1826-1903）和李望洋（1829-1901）建立，主祀岳飛，是臺灣少數以岳飛為主神的廟宇，廟名取自「碧血丹心望曉霞」，隱喻脫離日治政權的盼望。作為民間信仰機構，碧霞宮的主祀與廟名呈現了對政治的關注，其門生制度更是將岳飛作為恩主[1]，透過扶鸞問乩，鼓勵門生學習岳飛「忠孝節義」、「報效國家」、「奉獻情操」的精神。此外，碧霞宮也設置以儒家思想作為品格教育基礎的「勸善局」宣講制度，宣講人不僅在廟埕進行宣講，也會舉辦移動式宣講堂到各處宣講善書，在地方上甚為知名。[2]由於宣講需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加上鸞堂制度本身就是源自於清朝時書院制度，因此碧霞宮的門生制度在入鸞堂前就必須經過品德、知識審核，大部分成員以文教界公務人員等文人為核心。[3]也因此，碧霞宮作為民間信仰中心，事實上也呈現其對政治和品格教育的關注。

在此脈絡中，地方文人方坤邕（1923-2002）是延續文人在廟宇中的脈絡，擴大「教育」在廟宇中效應的重要人物。本次研究，不同於過往文獻將方坤邕作為碧霞宮口述史的媒介，而是透過方坤邕的個人檔案修復，重新整理其個人史、授課檔案與

---

[1] 鸞堂又稱「儒宗神教」，而鸞堂信奉者認為恩主具有救世之力，因此恩主又具有「救世主」之意。溫國良，〈日治初期新竹廳之官廟（二）--關帝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162期，2017年9月28日。
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62/2349（2024年9月10日點閱）。

[2]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臺灣民主蘭城尋蹤文集》，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2024年。

[3] 林靜怡，〈再探宜蘭道教寺廟碧霞宮建廟緣起〉，《宜蘭文獻雜誌》，第27期，1997，頁59-74。

文字創作，並以碧霞宮廟方以及方坤邕的長女方瑆、外孫謝以恭和其學生潘進華之口述歷史為輔助史料，從方坤邕的生命史理解其如何建立獨特的教育與信仰網絡。

此外，關於碧霞宮的創建緣由和時間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觀點以碧霞宮建廟建廟榜文為主，認為碧霞宮為進士楊士芳、舉人李望洋與宜蘭仕紳於日治時期，作為抗日基地所建；但根據黃文翰《宜蘭仰山書院文人及其制藝研究》一文的爬梳，其考證建廟榜文等檔案，認為碧霞宮早在清代便有鸞堂雛形，楊士芳和李望洋加入後修整成廟，且兩人任職日治官職，與政府關係緊密，因此對碧霞宮原出作為抗日基地的說法有其疑義。本文不涉入碧霞宮創建的考究討論，而從方坤邕的角度看其如何定位碧霞宮。

1. 廟宇 x 文人：碧霞宮與方坤邕的緣分

方坤邕生於1923年的宜蘭市區，並於宜蘭公學校畢業。而後因家庭窮困，1938年自宜蘭農林學校（現國立宜蘭大學）肄業，隔年入職宜蘭公學校（現中山國小）講師，開啟其教學生涯。1944年，方坤邕調入宜蘭市北國民學校（現為宜蘭縣力行國民小學）擔任訓導主任；1945年，由於戰時疏開的關係，宜蘭市北國民學校分址疏散教學，借用碧霞宮進行部分教學活動。[4]同年，方氏也暫調往礁溪庄大坡國民學校（現龍潭國民小學），直至隔年調回位於碧霞宮進行教學活動的北國民學校。此後，方坤邕便持續在碧霞宮進行教育活動，也在1946年加入碧霞宮門生，奉派學禮誦與儀宣。此

[4] 根據力行國小校史簡介，1945年分址疏散教學場地包含宜蘭各大廟宇：「.....辦公室借雷音寺、文昌宮二教室、市營避難民房四教室、慶和廟一教室、大道公廟一教室、新店部落所二教室、徐氏民房一教室及碧霞宮、城隍廟、家畜組合等。」〈校史簡介〉，《宜蘭縣力行國民小學》，https://www.lses.ilc.edu.tw/2011/08/17/%E6%A0%A1%E5%8F%B2%E7%B0%A1%E4%BB%8B/（2024年8月7日點閱）。

時的方坤邕，年僅24歲。儘管北國民學校的教學活動在1950年新校舍建成回復正常，但方坤邕仍持續在碧霞宮進行門生儀式。

由於當時碧霞宮就已經是文人匯集的場所，其中陳金波影響甚多，[5]當時可能因爲陳金波是仰山吟社創始社長同時也是碧霞宮門生的雙重身分的關係，仰山吟社的例會都於碧霞宮舉行。[6]而從1946年就加入碧霞宮的方坤邕自然也浸潤在這些環境中，成為陳金波先生提攜的後輩，[7]因此自開始教書的1938年到1971年退休前，儘管方坤邕仍然在宜蘭多所國高中、國小擔任教師、督學與校長，方坤邕也一直也沒也停止在碧霞宮進行門生的活動。在這過程中方坤邕不斷的學習，培養自身的學識。這樣的孜孜不卷也讓方坤邕和陳金波有了同樣的雙重身分：方坤邕於1962年加入仰山吟社、孔孟學會，學習做漢學詩，並從1965年開始擔任碧霞宮的管理職位。

根據方坤邕長女回憶，父親非常喜歡岳飛的故事，認為岳飛展現了為人的骨氣，以及為國家付出、不畏個人強權的決心。也因此，方坤邕對於碧霞宮的岳飛信仰，並不停留於民俗信仰的傳承或心靈的寄託，而是更致力於將廟宇活動結合文人教育，使其成為展現品格教育和人情義理的場所。此外，雖然本文前言提及，碧霞宮的創建是否具有抗日意識有多種說法，但從方坤邕1981年作為碧霞宮管理人受訪的內容可以看到，其立場仍與碧霞宮建廟榜文一致，認為民間雖有扶乩神旨的說法，但榜文更呈現了文人精神與抗日決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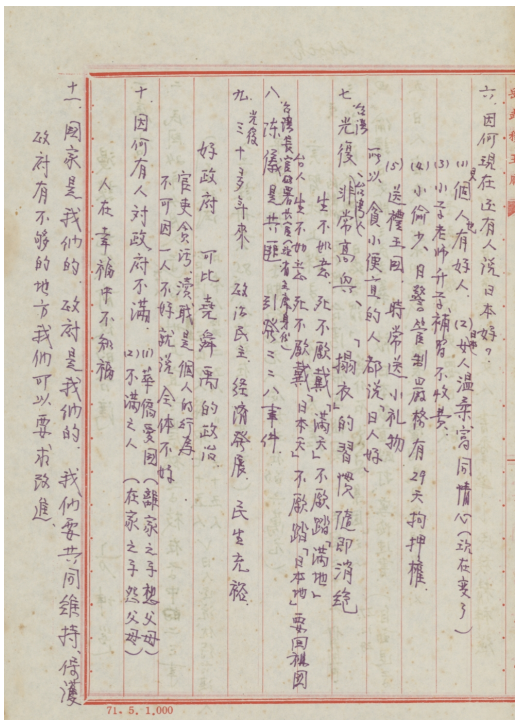
[5] 陳金波(1889-1961)，字鏡秋，號雪峰，出生於宜蘭內員山山麓，幼習漢文，熟讀四書五經，後來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習醫，畢業後赴東京學醫進修，回臺開設太平醫院。與晚兩屆的蔣渭水私交甚篤，於1922年後擔任「臺灣文化協會」協會理事，並於1933年擔任「仰山吟社」創社社長，同時也是碧霞宮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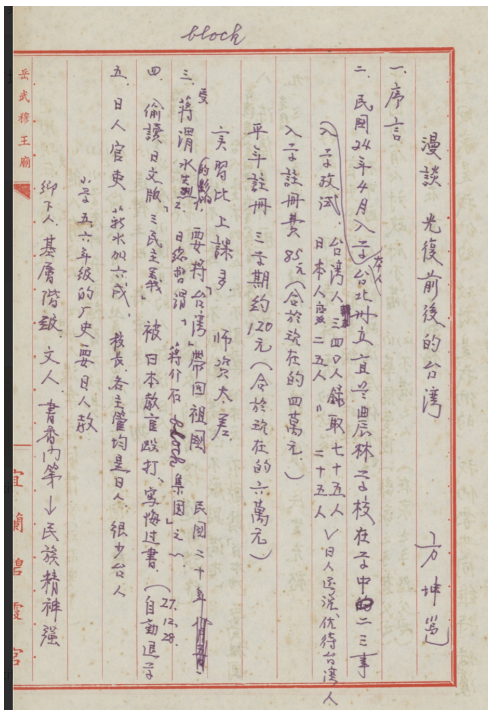
[6] 《詩報》第220號中紀錄到，宜蘭仰山吟社月例會，開於碧霞宮，1940年3月20日。

[7] 陳財發、周月櫻，〈宜蘭市耆老座談會紀錄〉，《宜蘭文獻雜誌》，第3卷，1993，頁88。

『最初是我們宜蘭一位進士楊士芳，在日本佔領臺灣時，本想返回大陸，結果扶乩請示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說：「所住地即漢土，不必離去，派岳王爺為後盾。」所以，楊進士就留下來，並且發起蓋廟，一方面祭拜岳王爺，一方面做為團結聚會的地方。』方坤邕說：『因此，在日據時代，這裏變成反日抗日的精神中心；廟裏面有書房，很多人都到這邊來讀漢文。』[8]

此外，其在碧霞宮稿紙留下的〈漫談 光復前後的臺灣〉手稿，紀錄自身受蔣渭水訓影響，日治時期仍偷偷閱讀日文版三民主義的事蹟以及「鄉下人、基層階級、文人、書香門第→民族精神強」的字句，雖全文未提及碧霞宮，仍隱含閱讀、教育能夠培養民族精神與抗日之意志，因此碧霞宮作為教育場域有其傳承民族精神的潛能。





[8] 郭俊良報導，〈民俗採集行之五 凜然傲世岳王廟〉，《民生報》，體育焦點第9版，1981年11月13日。

方坤邕手稿《漫談光復前後的臺灣》

檔案提供、修復數位化 / 謝以恭

宜蘭市碧霞宮(岳飛廟)理事長方坤邕認為，要破除陋俗迷信最好的方法，是請知識份子走進廟裡。方坤邕說，各種廟寺信徒眾多，許多迷信以訛傳訛幾成「事實」，若知識份子一直自命清高，不願參與廟寺活動，祇在廟外嚷嚷破除迷信，祇會給不肖的神棍製造機會，乘機斂財斂色。[9]

而在1986年的一份抨擊民俗醫療有關的報導中，我們又一次看到方坤邕對碧霞宮的態度，認為知識分子應在廟宇扮演破除迷信的角色。

2. 學校X品格教育：以儀式結合體制內外的教學場域

碧霞宮每年在岳飛誕辰舉行的祭典活動是宜蘭地方的重要盛會，以傳達岳飛精神為宗旨。碧霞宮的「祭祀岳武穆王」是全臺灣唯一類似祭孔釋奠之禮，以佾舞搭配完整的三獻禮。[10]這套儀式相傳最早由碧霞宮校正楊士芳傳承，經歷徐桂台、方坤邕等門生多年來的傳承，最終形成現今儀制，而碧霞宮成為全臺三獻禮的重要指導中心，各地寺廟若欲舉行三獻禮，也往往會向碧霞宮請教。[11]1969年方坤邕同時作為宜蘭高中師與碧霞宮核心人士的角色，在碧霞宮的祭祀改革進程中，促進了這兩種不同教育體系的資源流動——其至各地學習祭孔音樂，並邀請當時其任職的宜蘭高中（後

[9] 吳敏顯報導，〈請知識份子走進廟裡！民俗醫療大行其道．如何破除迷信值得深思〉，《民生報》，地方新聞版第11版，1983年06月28日。

[10] 李斐婷，《宜蘭碧霞宮岳武穆王誕辰祭典三獻禮儀式音樂研究》，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論文，2009年，頁17。

[11] 楊士芳為宜蘭第一進士，對宜蘭文化系統影響深遠，而徐桂臺、方坤邕等人皆為碧霞宮校正，校正作為鸞堂之師，具有傳承儀式之責任與義務。

因師資流動，轉為宜蘭高商）國樂社老師黃文亮負責學生培訓，透過學校教學持續傳承民俗祭儀活動。[12]

值得注意的是，方氏更在當中結合個人作詞曲長才，參考明代古譜協助填詞作曲，創作出碧霞宮廟歌《頌岳武穆王》，因此在儀式最後安排全排高歌《滿江紅》和《頌岳武穆王》連結信仰崇拜和「精忠報國」的重要性。除了誕辰祭祀的音樂儀式，也顯示在以碧霞宮名義舉辦的愛國歌比賽，根據方坤邕長女回憶，方氏擔任碧霞宮董事長的期間，曾以愛國歌曲比賽取代歌仔戲2-3屆，更邀請五花瓣合唱團第二代主唱徐薇薇，即門生徐桂臺之女主持。本文雖無法更多元的取得碧霞宮舉辦愛國歌曲比賽的相關資料，但就儀式納入《滿江紅》便可看見愛國情懷的影響，該曲正是1980年代各縣市歌唱活動的指定曲目之一。[13]對方氏而言，音樂祭儀不只是岳飛信仰的傳遞，更應隨著朝代變革有所修正，且也能作為凝聚眾人對國家向心力的媒介。

3. 傳統書院到廟宇鸞堂：教化功能的場所轉換

在清朝時期，教化百姓一直被視為傳統士紳與地方官的重要責任。主要通過「官方教化」和「民間教化」這兩種方式實施。官方教化主要表現為每月朔、望日舉行的宣講聖諭活動，而民間教化則由地方士紳組織的善社和鸞堂來執行。[14]這兩種方式共同構成了清代宜蘭地區的教化體系，旨在提升民眾的道德水準和社會認知。

---

[12] 李斐婷，《宜蘭碧霞宮岳武穆王誕辰祭典三獻禮儀式音樂研究》，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論文，2009年，頁123。根據黃文亮口述，碧霞宮的祭儀改革與執政者改變有關，由於原祭儀傳自清代，而在國民政府執政之下，方坤邕認為應以所變革，故派人至台北孔廟學習，但依據其武廟特質採用不同的音樂、舞蹈與服裝。

[13] 李筱峰，〈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愛國歌曲」內容析論〉，《文史臺灣學報》創刊號，頁125。

[14] 據資料記載，宜蘭地區於清代曾設有「覺善社」等善社，以及新民堂、鑑民堂等鸞堂。

直至1895年，隨著臺灣割讓給日本，教化體系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日本政府的皇民化政策推行同化教育，以「國語（日語）」為統治手段，臺灣自清代以來的府、縣儒學等官學關閉，傳統的書院等傳統的文人互相學習的場所，也轉而被國語傳習所和公學校等國語教學取代。在宜蘭，儒學（孔廟）、仰山書院（文昌宮）原址也被另作他用。[15]此時雖然，民間的鸞堂在短期成為漢文教育的避風港，許多仰山書院的師生轉向鸞堂，不過隨著時間消長，大部分的鸞堂也接著因各種因素停止活動，只剩喚醒堂和碧霞宮的「勸善局」這兩個相對年輕的組織成為新的教化中心。[16]1905年（明治38年），由於喚醒堂出資者，同時也是當時頭城地區的富賈盧廷翰去世，喚醒堂暫停宣講活動。此後，宜蘭地區只剩下碧霞宮的鸞堂門生制度成為這些文人聚集與在進行宣講勸善的場域。值得注意的是，碧霞宮的這一宣講活動並未隨著時代變遷而消失；相反，它從日治初期一直延續到戰後，成為了碧霞宮最具特色的活動。

1971年方坤邕自宜蘭高中退休，其仍持續精進漢學詩與廟宇服務，這樣的雙軌推進，讓他能夠延續碧霞宮內廟宇與漢學共榮的場景。值得注意的是，碧霞宮《宜蘭縣文武二聖祭祀專輯》中提到，1971年後碧霞宮鸞堂宣講活動式微，宣講活動轉型為「講經說道」，並由方坤邕擔任解說工作，持續提倡孔孟仁愛與勸善精神，廟堂更開設圖書室供民眾自修，廟宇的教育功能更為普及，而不限於宣講勸善。方坤邕留存的手稿，紀錄了其在碧霞宮除了《四書》課程，亦以「閩南語」教授《道德經》、《弟子規》等儒學經典，並在1999年以仰山吟社名義開班在碧霞宮上課。除了碧霞宮，19

[15] 黃文瀚，宜蘭仰山書院文人及其制藝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1年，頁177。
[16] 王莉雯，《宜蘭碧霞宮扶鸞宣講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2006年。

99年開始也在宜蘭縣孔子廟開辦詩學研習班、詩詞吟唱班，可見方坤邕一生致力於保護和傳承廟宇與漢學的傳統文化，並為學子們提供更多學習的資源。[17]

碧霞宮自日治時期以來多以《治世金針》、《敦倫經》等鸞書進行勸善與教化，然而傳承到1980年代左右，方坤邕開始在廟中宣講和授課時，卻更著重在儒家思想的學習及閩南語的傳承。課程中方坤邕的教學有兩項特色，其一是以教授儒家思想為主的《道德經》、《弟子規》、《論語》等書籍，其二是以閩南語教學。我們在方坤邕遺留的卡帶中，發現閩南語韻書《彙音寶鑑》和閩南語發音教學卡帶，雖未能確認是否為上課教材，但在1980年代「說國語運動」的背景下，國民政府大力推行「中華民國國語」，但方坤邕卻以碧霞宮為基地，維持閩南語教學儒學經典，並以不同媒介紀錄、傳承閩南語，使其自身兼具了維繫閩南語教育和漢詩詞傳統的重要任務。

小結

臺灣寺廟的社會功能演變是一個複雜而持續的過程，反映了臺灣社會的變遷，也展現了傳統文化機構在面對現代化挑戰時的適應能力，而方坤邕作為兼具廟宇信仰、文人仕紳的角色，引領宜蘭碧霞宮走向不同於傳統民俗信仰的路線。

方坤邕退休前主要在體制內學校任教，然而其也積極參與碧霞宮、仰山吟社的活動，此些組織與仰山書院關係密切，事實上日治時期書院受打壓、官方儒學系統式微後，書院中的師生便轉向鸞堂發展。傳統廟宇不僅是宗教場所，更是教育、社交、慈善和文化傳承於一體的綜合性社會機構，通過設立私塾提供基礎教育，作為社區聚

[17] **方坤邕與碧霞宮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也在1971年退休後全心投入於碧霞宮的文化活動。他曾於1965年擔任碧霞宮副董事長，接著在1969年、1972年、1978年、1981年擔任碧霞宮董事長，並於1984年擔任碧霞宮監事主席。**

會和交流的中心促進社會凝聚。同時，還肩負著救濟貧困的重任，這些多元化的功能使寺廟成為維繫社會秩序和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支柱。而從方坤邕延續了碧霞宮的文人入廟的特色，透過開班授課，以及與體制內學校的合作，深化廟宇社會教育功能，讓廟宇不只是信仰場所、傳遞勸善價值，更作為中華文化傳承的基地。

王莉雯在《宜蘭碧霞宮扶鸞宣講之研究》提到，長久以來學者們多集中研究儒家思想在學術、科舉官僚系統與國家政策中的影響，卻忽略了廟宇這類社會性、宗教性組織的重要性。而此份研究，希望透過梳理方坤邕的相關檔案，初探方坤邕如何看待教育，以及如何將碧霞宮作為儒學的傳承基地。透過民間信仰，將其比成的文人價值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晚年，方坤邕仍圍繞著碧霞宮的管理與宗教文化的推動，但並未因此停止對個人文化理想的追求，他開始整理自己的日記和檔案，並由其學生潘進華協助出版《玄伯吟集》，系統性地記錄自己在文化與教育方面的思考與貢獻。

本次也透過實地踏查，發現大部分的廟宇楹聯仍留存在廟宇中，這些不屬於紙本中的文學，或許是在地居民日常中最常見的文學作品。方坤邕長女提到父親常言「人要有骨氣，要為國家而奮鬥，而不是屈從於強權。」，其對岳飛的形象具有強烈的情感投射，在本案田調其為廟宇撰寫的楹聯中，也發現大多為關公、挪吒太子等具有義氣形象的神祇，而較少見媽祖等女性神祇。

此外，方坤邕也將授課資料與手稿等傳承給學生，而非家族成員，其教育傳承並非以親疏遠近為考量，而是以最能傳承其儒學、愛國精神為出發。這些檔案資料不僅記錄了他個人對地方文化的看法，也為後來者留下了寶貴的社會教育與宗教改革經驗。正如同其相信，只有通過不斷的反思與行動，才能真正實現廟宇與社會教育的有機結合。

關於本案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不同類型寺廟的轉型策略，以及這些策略對寺廟自身發展和社會影響的長期效果，並重新將廟宇的教育歷史納入教學史中；同時，或許可以進一步回看「廟宇楹聯」的文學性，讓被遺忘的文學作品，重新在文學史中顯影。

參考資料

林玉體，《臺灣教育面貌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9年。

林永龍，《民間文化與蘭陽風教發展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2005年。

方坤邕，潘進華印，《玄伯吟集》，宜蘭：明原印刷。

王莉雯，《宜蘭碧霞宮扶鸞宣講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2006年。

王志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與飛鸞勸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李筱峰，〈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愛國歌曲」內容析論〉，《文史臺灣學報》創刊號。

李斐婷，《宜蘭碧霞宮岳武穆王誕辰祭典三獻禮儀式音樂研究》，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論文，2009年。

黃文瀚，《宜蘭仰山書院文人及其制藝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1年。

陳淑美，〈【臺灣篇】回到歷史現場：臺人眼中的中日戰爭〉，《臺灣光華雜誌》，1995年。

陳柏宇，〈「文化立縣」下的地方歷史書寫— 以《宜蘭文獻雜誌》為中心(1993-2005)〉。

魏翊如，《2008宜蘭孔廟釋奠禮樂文化之研究》，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2009年。